

# 晚年恩格斯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叶庆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管理哲学专业博士生)

**摘要:** 晚年恩格斯在面对资产阶级反共、无产阶级理论陷入混乱和党内机会主义流行的时代形势下, 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操控背后虚伪的一面, 在根本上维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不受侵害。而葛兰西看到了无产阶级运动面临法西斯主义攻击下频频受挫的现实和党内机械主义的危险, 领悟无产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统治中最牢固的手段——意识形态领导权, 来夺取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相似的时代背景却造就了两个伟大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意识形态理论上, 恩格斯致力于维护马克思生前与恩格斯创立的意识形态理论, 维护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成果, 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而葛兰西看到的是意识形态作为文化领导权可以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胜利, 意识形态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有工具。从两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区别。

**关键词:** 意识形态; 晚年恩格斯; 葛兰西; 马克思主义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deology Theories of Engels and Gramsci in Their Late Years

Ye Qingge

(PhD candidate in Management Philosophy,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Engels sharply exposed the hypocritical side of capitalism behind ideological manipul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era of bourgeois counterattacks, the chaos of proletarian theory, and the prevalence of opportunism within the party, fundamentally safeguarding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orthodox Marxism from being violated. Gramsci saw the reality that the proletarian movement was frequently frustrated by fascist attacks and the danger of intra-party mechanism, and realized that the proletariat should use the strongest means of bourgeois rule - ideological leadership - to seize the victory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Simi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s have led to two different views of two great scholars on ideological theory.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theory, Engels was committed to upholding the ideological theory created by Marx and Engels during his lifetime, maintaining the purest Marxist achievements, and drawing a clear line with capitalism. What Gramsci saw was that ideology, as cultural leadership, can bring victory to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deology is not a unique tool of the bourgeoisie. From their ideological theory,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Marxism and orthodox Marxism.

**Key words:** ideology; Engels in his later years; Gramsci; Marxism

## 前言:

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成功问世与广泛传播引起了广大资产阶级的恐慌, 特别是马克思去世之后, 资产阶级采取了歪曲马克思主义原意、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等手段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对于马克思生前由于实践经验不足、理论框架尚未健全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环, 资产阶级在鼓吹自身意识形态合理性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展开迅猛的攻势。不仅工人大众受到了当时资产阶级歪曲理论的迷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派”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错误地解读和宣扬, 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着巨大危险。晚年的恩格斯, 在面临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威胁时, 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 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特别是阐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特征, 由此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 弥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缺失的部分。因此笔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部分时着重研究了晚年恩格斯阐述的较为成熟、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而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部分时, 则研究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二者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都具有重要的革命实践因素和资本主义巨大威胁因素, 笔者以期在意识形态理论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分析以晚年恩格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葛兰西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 一、揭露虚假的面具——晚年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恩格斯晚年(1883年起至1895年去世前)对马克思的贡献是巨大的, 而且是多方面的, 其中对于意识形态方面也多有涉及。<sup>①</sup> 在最初的1884年, 恩格斯通过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资产阶级学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强烈的批判, 对资产阶级歪曲无产阶级理论进行了驳斥, 揭露了资产阶级隐藏在表面下

的“虚假性”, 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如同郑永廷学者在其著作中所言,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包括准备阶段(1844年之前)、初步形成阶段(1845—1856)、深化阶段(1857—1883)、完善阶段(1884—1895)<sup>②</sup>。因此, 从时间和阶段性上看,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最重要的基石, 那么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则标志着恩格斯着手完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阶段的开始。1886年恩格斯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文中明确分析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关系, 提出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1890年至1894年之间, 恩格斯写给康·施密特、瑟夫·布洛赫、弗兰茨·梅林、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五封书信, 是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文献。这五封书信系统阐释并完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 修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论述不足问题, 解救了资产阶级恶意歪曲意识形态理论以及党内机会主义的危险, 批判了资产阶级哲学、宗教学和宗教学, 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合力”作用, 从而最大程度地完善意识形态理论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马克思在世时, 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取得了十分重大的进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 就分别有明确地提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概念, 阐述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含义、实质和基本规律。在书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至少包括有如下涵义: 虚假的观念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革命阶级。<sup>③</sup>

第一, 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 它是人为臆造的, 是带有欺骗性色彩的贬义词汇。恩格斯在1893年《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说: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

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sup>④</sup>这里恩格斯主要批判的是唯心主义史观的意识形态说,他认为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弊端就是没有认清意识形态最根本的来源是存在而不是纯粹的思维。“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sup>⑤</sup>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观念,它在人们日常的社会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中产生,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通过自身主观臆造出一套虚假的观念体系,并且人们创造的主观观念体系会反过来制约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产实践活动。意识形态作为这样一种虚假的观念,无法正确反映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包括自身内部真正的关系。

第二,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创造的关于自身统治的“幻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统治者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合理性”,维护自身的统治利益,从而使的被统治阶级能够在这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服从统治阶级的统治。然而并非所有理论,所有思想体系都能够被统治阶级所接纳,统治阶级必须采用最大限度维持自身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来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的:“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sup>⑥</sup>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利益奋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充满了阶级统治的味道。

第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有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得于产生,它是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到了这一层含义,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进入到更深刻的层面,意识形态开始变成不完全贬义的词汇。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作辩护,它离不开统治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意识形态成为支配整个国家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因此意识形态的形成,又与国家特定的物质经济基础有关,并且形成于社会每个人的日常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之中,与社会个体密切相关,反之又控制着社会的每个个体。在恩格斯写的《卡马克思〈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恩格斯阐明了这一观点,“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了各社会的阶级斗争”<sup>⑦</sup>。晚年的恩格斯把意识形态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载体,意识形态作为阶级斗争的载体又决定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由此经济条件上产生的阶级矛盾。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不同阶级对于他们特定物质经济基础的反映,可以产生剧烈的阶级矛盾。革命阶级正因为阶级意识形态与国家整体意识形态产生强烈碰撞,而这种碰撞来源于特定阶级经济基础与国家统治阶级经济基础的矛盾,随即以意识形态作为思维载体的革命斗争因此爆发。

恩格斯晚年,世界无产阶级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之后,无产阶级政党的影响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政党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此同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围攻”更加猛烈,资产阶级开始大规模宣称无产阶级理论的歪曲、空洞,并且加上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机会主义和青年派的错误宣传,使得恩格斯除了发布《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文章后,还接连在1890年6月5日的《致保尔恩斯特》,1890年8月5日的《致康·施密特》,1890年9月21日的《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的《致康·施密特》,1893年7月14日的《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的《致博尔吉乌斯》等几封书信中<sup>⑧</sup>,批评了当时许多青年学者未加深刻研究就将唯物史观错误地加以理解、宣传,忽视意识形态做必须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和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青年派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危机和革命理论危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恩格斯在书信中反驳了青年学者巴尔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重新阐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密特》的信中进行

了反驳:“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原始的动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这是第二性的作用。”<sup>⑨</sup>并且,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强调“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在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虽然不起决定作用,但是,它们对于历史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晚年恩格斯在书信中一再强调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这里面肯定了意识形态具有的辩护功能和教化功能,阐述了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诸多包括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式的有机体系的存在,这些意识形式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这些意识形式对社会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反映,能够对人的活动起着指导作用。但同时意识形态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并不是都能够及时和正确地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它与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尽管它不完全同步于社会实践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晚年恩格斯在面对马克思主义受到巨大威胁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最薄弱的一环,维护了马克思主义最宝贵、最正统的成果。我们也不难发现,晚年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十分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意识形态始终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一种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同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与社会存在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社会个体与社会实践活动密不可分,意识形态产生于个体的生产实践活动又反过来无形地控制着每个社会个体。

## 二、争夺革命的武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面对第二国际将唯物主义机械理解、法西斯主义鼓吹所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革命危机时,葛兰西提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晚年恩格斯理论背景相似,葛兰西同样面临着党内、党外、资产阶级反革命等社会严峻形势。面对如此严峻的革命形势,葛兰西一如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坚韧顽强,尽管在狱中受尽折磨依旧完成了《狱中札记》这部宝贵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著作。

在意识形态理论上,葛兰西受到了列宁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但在革命实践上,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却频频遭到挫败。葛兰西深刻分析了其中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因素,最终在《狱中札记》中完善地阐述了其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权力化特征,还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日常化。他从实践哲学出发,赋予意识形态以实践属性、权力属性和大众属性,使意识形态具有了日常化倾向。在论述意识形态领导权之前,葛兰西先自我设定了一个“市民社会”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批判吸收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从经济关系中完善和发展了市民社会的内涵。他认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反映的是“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sup>⑩</sup>然而葛兰西在吸收马克思“市民社会”的概念后,赋予了它新的涵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市民社会”的概念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但是葛兰西却将“市民社会”放置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sup>⑪</sup>因而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同属于上层建筑的两个不同的层面,“市民社会”具有不同于“政治社会”的非政治性。

在《狱中札记》一书中,国家被葛兰西视为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政治社会”充当国家专政统治的工具,是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而设置的暴力机构和强制机器，统治者通过设置一系列军队、法庭、监狱等强制执行机构来控制人民。

“市民社会”则担任的是国家专政“教育”的角色。“市民社会”作为国家传播思想和舆论的工具，被统治者用来宣传其意识形态，以达到使用非暴力的手段就能维稳国家统治的效果。通常“市民社会”包括教会、工会、学校、媒体、报社等日常活动、教育与宣传机构。统治阶级通过利用“市民社会”，利用社会教育组织和宣传机构，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民众灌输其意识形态思想和统治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从而影响和改变人民的道德选择，使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三观和道德评判标准趋于一致，使被统治阶级发自内心的服从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由此统治阶级便实现了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取得在国家统治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关于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市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葛兰西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概念。“知识分子”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代理人身份，行使对社会进行文化霸权的社会职能，是统治阶级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落脚点。葛兰西进一步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指与旧的生产关系、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他们与旧的生产关系一同存在于现行的社会体制下。有机知识分子是“每个新阶级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新的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sup>④</sup>有机知识分子具有的特征是，他们顺应现有生产关系和体制的发展，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他们担任着宣传员和组织者的身份，传播着新兴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要把市民社会中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提升到与本阶级集团一致，从而使得整个市民社会与自身阶级集团的利益趋于一致化，帮助自身阶级集团取得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有机知识分子与新兴阶级密切相关，在葛兰西那里，这些新兴阶级则是指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要从无产阶级的理论和革命经验中汲取宝贵经验和理论思想，同时又要向工人阶级及其广大市民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获取广大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认同感，获得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因此我们回望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其最重要也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争夺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总是与领导权密不可分，领导权总是首先体现于意识形态之上。并且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新兴无产阶级都可以用之于政治运动中。新兴阶级需要在市民社会利用有机知识分子打破一个缺口，通过源源不断地宣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只有获得文化领导权才能彻底推翻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在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同样需要知识分子对于市民社会进行不断巩固和维稳，需要利用意识形态领导权来保证自身统治。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又与有机知识分子的传播及社会广大民众的“同意”不可分割。

### 三、关于晚年恩格斯与葛兰西在意识形态理解上的差异

#### （一）意识形态的革命性质不同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意识形态一词，具有明显的贬义含义。意识形态在这里具有的是虚假的观念体系的涵义。特别是恩格斯是在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虚假性的基础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更多地用于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剥削与虚伪。如“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的过程了”。在原文语义中“思想家”就是指唯心主义思想家，他们只在思维范围内研究意识形态的产生问题，而不去研究那些看上去与意识比较疏远，又“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因此，他们只看到人们的思维支配了行动，却看不到思维背后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深刻的经济根源。

葛兰西则对意识形态做出了较为中性的理解。葛兰西在这一层面上显然受到了列宁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每一个阶级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有，无产阶级亦然。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在强调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无法修补的“阶级鸿沟”，是统治者强迫人

民顺服其统治权威的工具，是一种压迫式的政治工具。但是葛兰西认为，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忽略了人民的真实性和能动性，他认为每个人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每个人都能通过批判原始的常识层面的自发哲学，形成融贯一致的世界观，达到意识形态的统一。由此，意识形态可以凭借人民群众的“同意”，而获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无产阶级要想革命事业胜利就务必实现在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并且是可以被人民群众所接收并“同意”的。

从两者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及其尖锐和非让步的，包括资产阶级利用意识形态进行国家统治的手段，也被恩格斯进行强烈的批评。但同样的方式在葛兰西那里得到了缓和，并认为无产阶级需要运用一个有效的工具使革命成功。用唯物史观的视角分析，这与二者的时代背景有关。晚年恩格斯著书写信之时，正是马克思去世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分裂，无产阶级理论遭到资本主义侵蚀之时，恩格斯迫切需要的是尽可能地维护最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以免受到资产阶级的歪曲和利用，所以在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始终持否定的态度，以扫清党内资本主义理论入侵和歪曲的危害。而葛兰西正处一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猖獗，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频频失败，惨痛的革命实践让葛兰西看到国家统治中最坚硬的堡垒——市民社会，所以葛兰西寄希望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希望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来建立属于无产阶级自身坚硬的城墙。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用意识形态这一理论作为揭露资本主义虚伪的统治面具的目的上来看，葛兰西对意识形态进行中性的解释显然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 （二）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不同

恩格斯在书信中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肯定意识形态具有的辩护功能和教化功能，阐述了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诸多包括哲学、宗教、政治、艺术等意识形式的有机体系的存在，这些意识形式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恩格斯认为，在经济基础的必然性作用下，意识形态各种形式之间并非彼此孤立发挥作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共同对经济基础起作用。以经济同哲学的关系为例，经济在哲学的产生发展中“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和道德的反映”。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反作用，概括地讲就是“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它可以满足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需要，由此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精神武器”。这一“精神武器”具有斗争的政治性与革命性，并且还可以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对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则是从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部分，是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进行宣传和组织的重要内容，它是具有非政治性，它更多地表现在文化的软实力影响上，而不是体现于国家政治机器中。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化、权力化特征，还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化。他从实践哲学出发，赋予意识形态以实践属性、权力属性和大众属性，使意识形态具有了日常生活化倾向。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意识形态早已与文化领域和技术领域深度融合，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使人们总是处于无形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的这种表现来源于文化的渗透。正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大众属性，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就和领导权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是可以被合理建构的，并且建构意识形态的目的就是为了掌握领导权。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工具化描述和对文化领导权的目的性指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葛兰西没有从思维与存在、脑力活动与智力活动的关系中去理解意识形态，而是重点从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出发，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提出，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文化渗透功能；同时，葛兰西想通过文化日常生活领域对意识形态进行新的建构，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

形态本质——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虚伪面具，从而弱化了当时无产阶级这一“精神武器”的理论力量。

### （三）意识形态的主体论述不同

晚年恩格斯维护了原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认为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必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要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研究意识形态理论，当时晚年恩格斯所处年代的“青年派”和党内机会主义就没有严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意识形态，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遭到错误的理解和宣传。

1893年7月，恩格斯致信梅林时提到：“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sup>④</sup>这里的“虚假意识”是对马克思批判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进一步深化。一方面，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是意识形态家群体自觉的精神产物，代表着特定阶级或集团利益；另一方面，恩格斯指出旧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虚假的意识”的表现形式，是由思想家头脑中制造出意识形态与物质生活条件相脱离的假象及由此带来的虚幻性所造成的。思想家们总是将自觉的精神活动当作一种独立于物质世界的过程。这也是晚年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落脚点，即从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否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认为意识形态是同经济状况还有历史环境中的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的。1894年1月，恩格斯致信博尔吉乌斯时进一步提到，“政治、法、哲学……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因而，经济状况并不是自动地发挥作用，而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人们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下，有意识地在现有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历史，而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凝聚和制约的。

而在葛兰西所处的年代，意识形态遭到一些机械唯物主义学者和唯物史观学者的滥用，要将意识形态得到正确的理解和阐发，必须将其哲学基础由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成一门实践哲学。“只有在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开辟了历史新阶段的完整的、独创的哲学的时候，才能领会辩证法的基本功能和意义，实践哲学则在既超越了作为过去哲学表现的传统唯心主义和传统唯物主义，又保持了自身的重要要素的意义上，做到了这一点。”<sup>⑤</sup>意识形态只有在实践哲学的指导下，才能真正被运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活动中，为无产阶级革命赢得最后胜利。

在这个背景下，葛兰西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们理解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方式，它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中，以及在所有个体和集体生活中显露出来的世界观”<sup>⑥</sup>，是指人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或信仰体系，并且这个思想体系是经过自身同意内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指出“人人都是哲学家”，每个人都会存在自己的信仰和对世界的看法。因此在大众中建构意识形态，是大众对其思想批评、认识、同意后的内化的思想体系，并以此思想作用于外部世界，使大众成为改造世界的一股力量。不得不说，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理论的主体理解从否定消极转变为了积极主动，体现了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性与创新性，也体现了主体“同意”的意义，肯定了意识形态终究作为一种思维哲学的改造力量。

### 结语

恩格斯晚年书信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和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思潮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经济因素同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客观规律同个人意志等理论，对指导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这些书信中的晚年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对于理解我国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在比较晚年恩格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后，有助于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当前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工作，发扬正确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树立正确的斗争精神是不怕困难、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可以说，坚持党对意识

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政治保障。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正确理解，要正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正如恩格斯在晚年书信中对青年派的告诫，要根据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解和教条主义应用。同时，在新时代的新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在破除时代困难、化解新矛盾的社会实践中推动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创新，使之适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需要。

### 参考文献

- [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7]孙玉河.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贡献研究[D].苏州大学,2013.
  - [8]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周宏.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流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2000(06).
  - [10]张秀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三个阶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05).
  - [11][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12]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13]俞吾金.何为“有机知识分子”?[J].社会观察,2005(08).
  - [14]杨百成.《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思想论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版),2001(05).
- 注释:
- ①孙玉河.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贡献研究[D].苏州大学,2013.
  - ②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6.
  - ③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37.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4-95.
  -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9.
  -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1-132.
  -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3.
  - ⑧孙玉河.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贡献研究[D].苏州大学,2013.
  -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6.
  -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7、130.
  - ⑪[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
  - ⑫[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 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51.
  - ⑭[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28.
  - ⑮[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28.
- 作者简介:叶庆革(1994.4-)男,汉族,广西贵港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管理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家治理,导师:刘敬鲁。